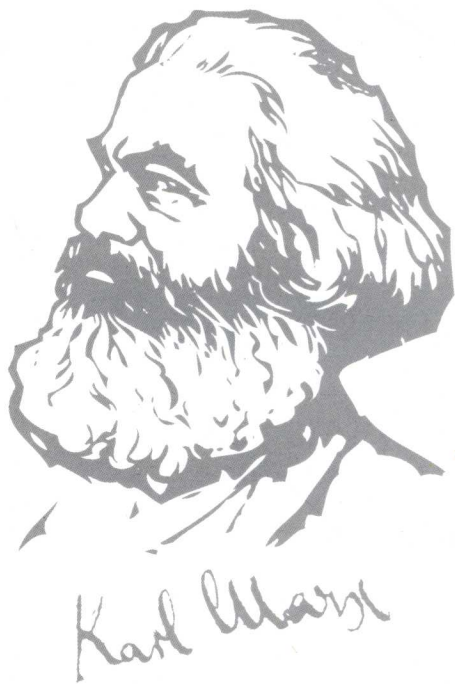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 著

郑吉伟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藏书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 著
郑吉伟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美) 罗伯特·布伦纳著; 郑吉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8-2

I. ①全… II. ①罗…②郑…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396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著

郑吉伟 译

Quanqiu Dongdang de Jingji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5.7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4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中文版序言

当前世界经济的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我没有详细比较）最具有破坏性的，可以想象它的严重性已经接近大萧条了。这是因为它暴露出了几十年来由债务包裹着的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出了战后时期所没有见到过的金融陷阱。资本积累的不断减弱和金融部门的瓦解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密切联系，政策制定者必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它的存在明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这次危机的分析者自然将金融部门和证券市场的崩溃作为其出发点（这也是“地震”的震中）。但是，从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到后来的一些人（很少有例外地）都坚持这种做法。他们现在承认这场危机是严重的，尽管到现在危机已经扩展到了金融部门以外的部门，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应在金融部门里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初在金融部门的危机是孤立的。相比之下，经济的基础是稳固的，不存在问题。在2008年3月，保尔森在次贷危机（the subprime crisis）之前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我们有六年的非常稳固的经济增长。”^[1]拿伯南克来说，他从2004年开始宣传“伟大的现代化”的思想，即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特别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经济更稳定，通货膨胀降低，经济表现良好，前景光明。^[2]在2008年9月，此时金融市场处在崩溃的边缘，保尔森提出他的庞大的银行救援的计划，200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其中的许多人来自哈佛、芝加哥和麻省，包括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封公开信中警告国会：“尽管它们出现了麻烦，但是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私人资本市场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根本上（通过政府干预）削弱这些市场来平息短期动荡的行为绝对是短视的。”^[3]这确实是当前正统的观点，或者说至少过去如此。但是，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具有误导性了。

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在过去 30 年里一个经济周期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地衰退，直到现在这个水平。资本积累和总需求长期下降的根源在于资本的回报率在体制范围内的大幅下降，并且没有得到恢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仅仅如此——源于全球制造业长期存在过剩产能即过度供给。从 1973 年长期衰退开始，经济当局通过更大规模的信贷（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从而支撑需求来延缓在历史上困扰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危机。但是，它们得到暂时稳定的代价就是停滞在加深，因为债务的增加和无法消解的过剩产能使经济对刺激计划越来越不敏感。1993 年的克林顿政府以及后来的欧盟试图打破这种债务依赖，承诺要平衡预算，但是这个目标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也没有实现。经济似乎可以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解放出来，通过万能的市场来推动发展。但是，这种巨大转变暴露了这个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停滞，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深层问题像以前一样束缚着它。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使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 1991—1995 年间进入到战后时期最严重的周期性衰退之中，充分表明这个制度缺乏动力，为一系列的重要金融危机的发生打开了大门——从日本，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再到墨西哥和巴西。

为了“止血”和保证增长，美联储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转向了日本经济当局在 10 年前类似环境下首先使用的解决办法。公司和家庭（而不是政府）通过大量借贷和透支性支出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些是由它们纸面上的财富的历史性增加而推动的，纸面上的财富又是由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和后来的低成本信贷而推动的。私人透支（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家庭的）替代了公共赤字。整个过程的关键是美联储最终担保的推动资产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廉价借贷。

结果是形成整个后来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削减投资导致企业对信贷需求的大幅下降。东亚国家政府不断购买美元资产（dollar-denominated assets），旨在压制它们的货币的价值，提高它们的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不断提供贷款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所以，长期借贷的实际成本在逐步下降。同时，一出现危机的征兆，美国中央银行就通过降低联邦基金利率（the federal funds rate）来确保短期利率不会高到危及在金融市场获取利润的程度。人们因此会看到世界经济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即资本积累持续下去已经发展到了依赖一波接一波的历史性的投机浪潮，这些投机浪潮由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规制者来精心呵护和公开合理化——首先体现在 1995—2000 年间的资产泡沫，以及在 2000—2007 年间的住房和杠杆信贷上。对高盛（Goldman Sachs）——不再是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是

对美国有利的事情。

从1996年起用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asset price Keynesianism）来替代呆板老套的凯恩斯主义，这给人的印象是（像其前辈一样）不能改变这个制度走向经济衰退的趋势。但是，它只能使这个制度暴露在危机之下。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推动了艾伦·格林斯潘的“新经济”繁荣，引发了一波巨大的自战后长期繁荣以来从未见到过的投资和消费浪潮。但是，到1998年夏天，随着美元的上值和东亚出现危机，美国经济扩张的脚步开始停滞不前，因为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和股票价格都在下降。第二年秋天，人们会看到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衰退发生了，这成为当前崩溃的一个预演，世界经济似乎走向深度的周期性衰退之中或者更恶劣的衰退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大幅度利率下降和放松信贷的其他措施，美联储成功地渡过了这次危机，证券市场的泡沫重新恢复，经济得以支撑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它不能阻碍这个制度在2000—2001年间走向严重的衰退，这个美联储主席吹嘘的信息技术股票的历史性崩溃使这个经济失去了它的主要动力即失控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表明了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难题再一次不断恶化，表明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借贷来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是通过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来推动的。

经济本身的脆弱性现在又拯救了经济。1997—1998年间和2000—2001年间世界经济的一系列危机导致公司对贷款资金需求的大幅下降。东亚的主权资金仍然通过包揽美国国内和贸易的赤字来推动美国创纪录的刺激计划。长期利率继续下降，为新一轮的泡沫经济（bubblenomics）提供基础，这一次降落到住房和杠杆贷款上。抵押利率大幅下降，推动了住房价格和房地产财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增长。住房贷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推动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的增长，而这些又使经济好转直到扩张。但是，甚至到2003年，私人投资、就业和出口都没有达到2000年的水平，尽管存在房地产泡沫扩大所引起的财富效应的有力刺激，更不用说布什政府的“里根风格”的预算赤字。另外，抵押市场已经达到顶点，因为人们能够买得起住房的能力在面对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时也开始削弱了，很快威胁到家庭纸面上的财富的上升，所以经济扩张也面临威胁，当然，这又一次表明经济不能根据自身的动力来推动其本身的发展。

正如在1998年，形势需要美联储进行大胆的干预来使投机增加、泡沫再次膨胀和经济增长起来。美联储这两年送的大礼就是实际短期利率下降到零以下，同时它决定允许抵押贷款标准出现历史性的下降——更不用说追求利润的贷款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张——从2003年起为出现次级抵押贷款

的突然而大幅增长创造条件，而次级抵押贷款为住房价格上涨和周期性扩张的持续提供了可能。即使如此，更加令人疑惑的是，如果能够找到足以这些不确定的贷款提供充足资金的贷款者，并且能够保持扩张的势头，那么长期利率也不会这样持续下降，长期利率的最初下降推动了住房繁荣，但也会使金融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并且住房的繁荣会驱使投资者热切地寻求更高的收益。正是证券（其背后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支撑）带来的收益率提高的幻象，导致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地方政府和世界范围的银行大量购买次级抵押贷款，从而支撑证券市场，而这最终为次级抵押贷款提供资金，从而使房地产泡沫扩大。这次全球借贷市场上空前的投机被证明是保证实体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

它证明经济在实际上如何失衡。尽管在美国实施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刺激计划——该计划由重新产生巨额的联邦赤字和创纪录的家庭借贷来推动——但是，与亨利·保尔森的意见不同，美国从 2001 年到 2007 年的经济周期是战后时期最脆弱的周期，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糟糕。当住房泡沫在 2006 年失去推力时，实体经济由于本身具有波动性而依赖于不合格贷款（nonconforming mortgage），就不可避免地滑向衰退了，同时，金融部门原先由于不合格贷款而支撑起来的高估值资产而忘乎所以，现在这些资产的价值也迅速下滑。住房价格减少了家庭的财富、消费需求和金融机构的资本，一场由实体经济下降和金融部门恶化相互作用的严重衰退就发生了。

导致严重的周期性衰退或进一步演化为制度上灾难性的危机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甚至内部人也如此）的金融部门的发展——也就是“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的兴起。根据华尔街的忠实拥护者的观点，信贷市场的狂热实际上不会使这个制度面临危险，因为经济在信贷上所依赖的大银行将其发起或购买的抵押在形式上进行证券化，并且卖到很远的国家和更大的范围，将风险分散到数百万的相互隔绝的投资者手中。但是 2007 年 8 月信贷链条的破裂很快就表明，现实正好相反。为了应对困扰着金融部门的不断激化的竞争和回报下降——以及华尔街惊人的贪婪和过度自信——美国最大的金融房地产公司力图继续支配它们根据或者超出资产平衡表而发行的大部分抵押所支撑起来的金融工具，并且这些金融工具通过短期信贷市场为同样的资产提供资金。所以，当住房价格快速下滑，并且通过“发起—证券化”（originate-and-securitize）的机制扩展开来时，很多这样的机构发现它们失去了资本，无法取得信贷，事实上进入破产状态。这似乎是公正的，但存在例外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企图将自

身与他们自己的公司的命运分开，惨重的损失首先重重地落在工人阶级和次级抵押产品的少数购买者身上。

金融市场的衰退削弱了银行向公司和家庭提供资金的能力，它们在此时面对住房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而突然收紧它们的贷款标准。根据这种方式，它大大加快了暴露在实体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利润的危机，这又加速了由住房不动产和住房抵押所支撑起来的证券价格下降，进而导致金融部门的崩溃更加具有灾难性。但是，信贷供给的下降最终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和家庭不能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信贷，而且是它们不会或者说不可能需要这些信贷。公司不进行任何投资，也不雇用工人，因此不会在整个产业周期中为了扩张而进行借贷。面对需求崩溃和利润下降，人们怎么会企望它们从现在开始投资呢？家庭在过去的7年里通过大量借贷、消费和住房投资而拯救了经济。但是，面对房屋价格急剧下降，并且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而劳动力市场又低迷，人们怎么会企望家庭会重新借贷和消费来重新开始拯救经济呢？经济面临自我强化的极其残酷的向下的恶性循环，市场信号在这种循环中告诉私人企业和家庭尽可能地收缩开支。不仅政府阻止这种衰退的愿望将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而且其阻止这种下滑的能力也将受到考验。

注释

[1] “All Things Considered,” NPR, interview with Melissa Bloch, 13 March 2008.

[2] See 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Remarks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20 February 2004, and “The Benefits of Price Stability,”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24 February 2006, both at Federal Reserve website.

[3] “Economists Against the Paulson Plan: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24 September 2008.

致 谢

我非常感谢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计划给予大量学术和道义上的支持，对我的书稿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同时，也要感谢马克·格利克 (Mark Glick)、安德鲁·格林 (Andrew Glyn) 和鲍勃·波林 (Bob Pollin) 慷慨地奉献了他们辛苦得来的数据，向我解释如何运用这些数据，对多种图形发表意见，花费大量时间和我讨论诸多经济理论和数据，从而大大提升了最终成果的水准。我还要感谢戴维·戈登 (David Gordon)、约翰·阿什沃思 (John Ashworth)、戈帕尔·巴拉克瑞施南 (Gopal Balakrishnan)、迈克尔·伯恩斯坦 (Michael Bernstein)、萨姆·鲍尔斯 (Sam Bowles)、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吉姆·戈罗宁 (Jim Cronin)、杰勒德·杜梅尼尔 (Gérard Duménil)、萨姆·法伯 (Sam Farber)、鲍勃·菲奇 (Bob Fitch)、迈克·戈德菲尔德 (Mike Goldfield)、洛伦·戈德纳 (Loren Goldner)、迈克尔·霍华德 (Michael Howard)、多米尼克·利维 (Dominique Lévy)、拉斯·梅乔塞特 (Lars Mjøsset)、乔纳森·摩西 (Jonathon Moses)、约翰·罗默 (John Roemer)、鲁恩·斯卡斯坦 (Rune Skarstein)、迪克·沃克 (Dick Walker) 和埃里克·赖特 (Erik Wright)，他们仔细地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宾·布莱克本 (Robin Blackburn)，他在通读了最初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上的本书初稿之后给予我耐心的、友善的、支持性的和实质性的批判。感谢史蒂夫·克恩 (Steve Kern) 和朱利安·斯托拉布拉斯 (Julian Stallabrass) 在改进本书风格和提高表述清晰度方面给予的广泛帮助，感谢戴夫·胡思 (Dave Huth) 仔细研究大量数据并教我如何使用它。我特别感谢苏珊·沃特金斯 (Susan Watkins) 通读了全部书稿，并对形式和内容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为本书的完成铺平了道路。约翰·罗杰斯 (John Rodgers) 在数据的收集和计算这一枯燥但又不可或缺的任务方

面，给我提供不断的帮助，这些计算要求将不同国家和多个部门的利润率收集起来。我非常感激他的无私相助。由汤姆·佩恩（Tom Penn）领衔的维索（Verso）出版社的团队〔包括帕特·哈珀（Pat Harper）、索菲·斯卡贝克-博罗斯卡（Sophie Skarbek-Borowska）以及安德烈亚·斯廷普森（Andrea Stimpson）在内〕，以高度的专业水准，加工了复杂的文本，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塞巴斯蒂安·巴詹（Sebastian Budgen）从头到尾编辑了文本，在完善它的形式和表达上做了大量工作，为此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汤姆·默特斯（Tom Mertes）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各种方式为我提供帮助——数据的收集、风格的改进、内容的批判、思想的建议等。他的帮助和支持对于我完成这个研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仅用“感激”一词是不能充分表达我的心情的。我最应该感激的是特里·埃德加（Teri Edgar），她不仅从开始时就以各种形式向我提供帮助，而且一直坚持在向成功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奉献着她的爱。

出版者说明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首先是在《新左派评论》1998年5—6月号总第229期关于世界经济的专刊中发表的；出于风格改进或表述更清晰的原因在这里进行部分修订。书中的图表都进行了更新，尽可能采用修正的数据。序言和结束语都是新的内容，两个附录也是如此。